



塔其

安德洛波夫死亡

一項由蘇共中委會、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部長會議聯名發表的訃告指出，蘇共總書記安德洛波夫在長期患病之後，於二月九日十六點五十分去世。訃告中對安德洛波夫大加讚揚，稱其進一步加強了黨的政治和組織活動，提高了黨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作用，並明確制定了黨和蘇維埃國家建設共產主義的當前和未來任務。這位在去（一九八三）年八月起，即未曾在公開場合露面的蘇共總書記兼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成了蘇聯史上在位最短的國家領導人。

安德洛波夫葬禮是於同月十四日舉行，由治喪委員會主席契爾年科（K. U. Chernenko）主持（他也是新當選的蘇共總書記），世界各國代表團前往弔祭。契爾年科在葬禮結束後發表演說，除讚揚安德洛波夫訂定了新的政治路線，加強了勞動紀律與改善經濟外，並強調蘇聯準備展開實際與誠實的對話。外長葛羅米柯及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也分別發表演說。

在安德洛波夫的死訊宣布前，蘇聯曾有種種不尋常的現象發生，包括國防部長烏斯汀諾夫取消六日前往印度訪問的行程，及安德洛波夫兒子匆匆由瑞典趕回莫斯科（他是蘇聯出席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歐洲安全與裁軍會議代表團的高階團員），因此，死訊的宣佈並不是令人震撼的突發事件。然對與蘇聯有外交關係的非共國家而言，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再去探索一個新蘇共總書記的性格與可能採取的政策，從而採取適當的對策。

安德洛波夫在十五個月的掌權期中，給人的印象是一種標榜實用、現實與紀律的現實主義者，然一年多來蘇聯在外交上却諸般不順利：蘇聯紅軍在阿富汗無法脫身，波蘭局勢沒有好的進展；在東西關係上也遭到挫敗，尤其是未能阻止美國在西歐部署巡弋和潘興飛彈，也未能藉此問題造成北約盟國的分裂，而徒然中斷美蘇限武談判，使美蘇關係降至低潮。但在內政上，尤其是經濟上，算是稍有成就。他提出經濟改革主張，強調勞動紀律與勞動生產率，加上撤換了一些不稱職的部長，使八三年的經濟計劃執行及各個項目的成長似都不錯。現在由於安德洛波夫的死亡，這些改革是否繼續堅持下去，則端視新總書記的政策如何而定。

總的來說，十五個月的時間對安德洛波夫而言是太短了。因此，他沒有機會留下任何真正的政績。可斷言的是，在未來的蘇聯歷史上，安德洛波夫僅能以「短期的領導人」一語帶過。

契爾年科繼任蘇共總書記

二月十三日蘇共召開中央非常全會。會中除對安德洛波夫的死亡表示哀悼外，並由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吉洪諾夫提名契爾年科出任蘇共總書記，獲得全會一致通過。關於這項結果，有些蘇聯人表示意外，有些則認為理所當然。

契爾年科原先並不被外界視為是最有希望的繼任人選，原因是：(一)在前一次的總書記角逐中，他已敗給安德洛波夫；(二)他年齡已高達七十二歲，而且身體狀況不佳；(三)由於安德洛波夫以高齡(六十八歲)當選總書記，而在就任八個多月後即因病無法公開露面，且於不久後死亡，因此在考慮下一任總書記時應會更注意候選人的年齡與健康狀況。然而契爾年科却仍然脫穎而出，這說明了：政治局的成員，尤其是元老派人物如葛羅米柯、烏斯汀諾夫、吉洪諾夫等，仍不欲年輕的一代掌權(指羅曼諾夫、戈巴喬夫，二人原先被視為是呼聲最高的繼任人選)，而欲由較保守的元老級人物來穩定局勢。根據華盛頓肯南蘇聯問題研究所的蘇聯政治局事務專家芮達威的說法，一位較年輕的人選對政治局中老一代的委員而言，是一大危險，因為在他上任的第一、二年內的主要活動，將是清除老委員與他們在蘇聯其他機構內的同黨與朋友，這是目前當權的老一代委員特別憂慮的事。

根據蘇聯的官方資料顯示：契爾年科於一九一一年九月出生於西伯利亞，為俄羅斯人。一九三一年加入蘇聯共產黨，一九五六年起在蘇共中央機構工作，一九六六—七一年為蘇共中央候補委員，一九七一年三月升為蘇共中央委員，一九七七年當選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八年被選為政治局委員。而契爾年科的真正發跡是在布里茲涅夫任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共黨第一書記時，擔任黨的宣傳部部長，因此建立起兩人的親密伙伴關係。根據一般的說法，契爾年科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生都在黨機關裏工作的典型官僚，強烈反對可能影響既定政治教條的任何新措施。以契爾年科的這種出身與性格，由他擔任蘇共總書記，是否會改變安德洛波夫生前的國內、外政策？

在國內經濟方面，雖然契爾年科在被選為總書記後的演講中指出，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已經取得的經濟發展速度和實幹精神，加強勞動、生產、國家紀律，並鞏固法制。但是，他亦強調，經濟結構的更新必須慎重進行，加上他在去年六月召開的中央例行全會上發言時，曾表明了不同意安德洛波夫改革方式的經濟政策，因此安德洛波夫在經濟改革上的一些措施，可能因契爾年科的掌權而退縮。

在對外政策上，契爾年科強調繼續加強蘇聯防衛能力，絕不允許別人破壞已經形成的軍事均勢，認為蘇聯應擁有足夠的手段，以便使好戰的冒險份子發熱的頭腦冷靜下來，並主張通過認真、平等、建設性的談判解決一切國際爭端。這種論調與安德洛波夫所強調的並無二樣。因此在外交上，契爾年科無疑是繼承了蘇聯過去的一貫政策，將不致有重大改變。就對美關係言，布希副總統雖稱此一權力轉移為美、蘇關係上的可能轉捩點，但大多數的美國官員均不認為美蘇關係會因契爾年科的上臺而有重大轉變。況且在新人接班後，將忙於鞏固地位和推動內政，是不會急於去照顧外交事務的。

由於契爾年科既缺乏經濟工作和外交、軍事事務的經驗，也未曾擔任政府的要職，他在實際事務的處理上，必須依賴其它政治局委員的配合，因而在集中權力之前(若他還有足夠的時間來從事這件工作的話)，必然是一個集體領導的局面。

「中」、蘇關係的展望

二月九日，蘇聯外貿部副部長葛里辛(T. T. Grishin)抵達北平訪問，而於十日簽訂一項貿易協定。根據此一協定，「中」、蘇在一九八四年的貿易將增加為八三年的二倍，而達十六億美元。又據蘇共國際部副部長科瓦倫科在訪問日本時證實，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I. V. Arkhipov)將在今(一九八四)年五月間前往中國大陸訪問，這將是近廿年來訪問中國大陸的最高階蘇聯官員。從這兩件事來看，「中」、蘇關係的發展似又向前跨了一步，然而這種發展是否會因安德洛波夫的死亡而有所改變，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中共在由「國家主席」李先念和「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彭真署名拍發的唁電中，曾重申改善雙方關係是符合雙方人民根本利益的；並派遣

了「副總理」萬里率團前往莫斯科弔祭。萬里不僅具有「副總理」的身份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是近二十年來前往莫斯科的最高階官員，顯示中共擺出了修好的姿態，然而蘇聯領導層却是沒有反應。蘇共新總書記曾與一些前往參加葬禮的外國政要舉行會談，包括美國副總統布希、英國首相奈契爾夫人、西德總理科爾；但萬里只會見了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阿利也夫（Geidar Aliyev）。雖然在兩人的會談中，雙方都重申願意改善關係，但無論莫斯科或北平都沒有在基本的政治歧見上讓步。這是否意味著雙方的關係將因總書記的更換而有所改變？

在探討這種可能變化之前，應先審視安德洛波夫生前對中共的政策是怎樣的。安德洛波夫在接任總書記職位之始，即強調要繼續執行布里茲涅夫的政策，並且在他任期中，分別舉行了第二、三回合的「中」蘇關係正常化政治磋商。這些磋商無疑是與布里茲涅夫在一九八二年三月於塔什干發表的對中共示好言論相符合，即試圖改善雙方的實質關係。因此，安德洛波夫的對中共政策是繼續了布里茲涅夫所宣示的路線。而契爾年科在接任的演講上，亦強調了政策的繼承性，亦即要繼承安德洛波夫的路線，果真如此，則契爾年科的中共政策也不會改變。另外中共「外長」吳學謙在二月十六日於北平會見紐西蘭工黨領袖朗伊時，曾表示：中共認為，蘇聯仍像慣常一樣，新領導層本身不會象徵外交政策的改變。既然雙方都有這種共同的體認，在「中」、蘇關係的未來發展上，新蘇共總書記的出現是不構成影響的。

在安德洛波夫執政期間，「中」蘇關係，據中共一再指出，其實並無實質變化。中共早就列出，要改善雙方關係，必須先解決三個主要障礙：蘇聯自中蘇邊境減少兵力或後撤、蘇聯不再支持越南入侵高棉、蘇軍自阿富汗撤退。安德洛波夫並沒有使「中」蘇關係更加惡化，但也沒有在上述三個障礙上做出讓步。「中」蘇關係的正常化既然是雙方長期的目標，因此它的改善與否將視那一方面先做實質的讓步，如蘇聯解除中共所謂的三大障礙，或中共放棄這三大障礙的說法，而這在最近都是不可能的事。第四回合的政治磋商即將於三月間在莫斯科舉行，可預見的是，在政治上恐亦無法獲得具體結果，而只能在經濟關係和文化、體育交流上繼續加強。

八三年經濟計劃執行總結

一月廿九日「真理報」公佈了由蘇聯中央統計局所作的一九八三年蘇聯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總結報告。這項總結報告計分六大部份，分別是：科技進展、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基本建設及提高人民生活的物質與文化水平等各方面的有關數字，其中科技進展這一項是今年總結報告首次出現的。

在總結報告中總的數字方面，國民收入較八二年增加百分之三點一，達到五、三〇〇億盧布（按實際價格計算）；工業總產值增加百分之四，達七、五二〇億盧布（按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批發價格計算）；農業總產值增加百分之五，達一、三四〇億盧布；外貿總額增加百分之六，達一、二七〇億盧布。在各項重要產品生產上，工業方面：電力較一九八二年增加百分之三，石油增加百分之一，天然瓦斯增加百分之六，煤增加百分之二，鋼鐵增加百分之四；上述各項目的產量較八三年原預定的成長目標分別提高了百分之一、百分之零點六、百分之零點八、百分之二、百分之零點一、百分之二。在農業方面：肉類一六百萬噸、甜菜八二百萬噸、馬鈴薯八三三萬噸、蔬菜二九百萬噸。

去年在安德洛波夫任內，蘇共中央及蘇聯部長會議曾通過多項決議案，企圖使蘇聯的經濟發展起死回生。這些決議案的重點包括了：擴大生產聯合體與工業在經濟活動上的權力，並加強它們對勞動成果的責任，加強勞動紀律以提高生產效率及激勵工人工作熱誠。另外，去年六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亦通過「勞動集體法」，規定職工和集體農場農民可參加討論自己企業和全國的經濟計劃，試圖以擴大勞工參與來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在

公佈的八三年經濟計劃執行總結中，工業總產值與農業總產值的成長都較八二年增加（八二年該二項目的成長為百分之二點八與百分之四），似乎是這些有關決議案或法案發生效用的結果，然這能代表蘇聯經濟已經好轉了嗎？

據著名的新西伯利亞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塔提安娜·札斯拉夫斯卡雅在最近一份被偷運到西方的論文中指出，蘇聯經濟發展的遲緩是由於經濟制度的不當，蘇聯的經濟成長率接近零，並且生活水準在許多年緩慢但穩定的提升後，現在正日漸下降。根據這個看法，蘇聯經濟困難的真正癥結是在於制度的不當，而不是因為勞工短缺、能源問題、投資缺乏效率和氣候惡劣等等，前蘇聯經濟學家伊戈·柏曼亦是持這種看法。而安德洛波夫在他當選總書記後十天的一項演講中即曾指出，要審慎地放寬由中央計劃的蘇聯經濟體制。顯然他是注意到了制度的不當對蘇聯經濟發展的妨礙，但是他亦無法真正解決這個問題，而只能從提高勞動生產率，激勵工人勞動情緒上着手。因為，中央計劃的經濟制度是共黨體制的特點，這個制度的改變，將使蘇聯在許多問題上無法自圓其說，而那些因中央計劃經濟而得利的官僚也不會輕易地放棄既得利益，他們抗拒的態度也將使根本性的改革制度本身難上加難。

全蘇東方文學研究理論問題學術會議

，以及中國文學與亞洲鄰國文學聯繫等問題。這種討論東方文學的會議每隔兩年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舉行一次。

研究東方文學是屬於蘇聯「東方學」的一部份，而在東方學的研究範圍中，又以漢學(Sinology)最為重要。蘇聯的漢學(或稱中國學)研究較之帝俄時代已有轉變，最大的不同在於研究目的上的轉變。帝俄時期的漢學研究着重於學術性，到了蘇維埃時期就偏向於政治性，這可從蘇聯遠東研究所(該所於一九六六年成立於莫斯科，是蘇聯漢學研究的重鎮)副所長克里夫佐夫在去年接受一項訪問時所說的話看出。他說遠東研究所在它成立的十六年半中，所出版的書主要是介紹中國經濟、國內政策、意識型態和文化；然而在帝俄時期漢學的主要研究方向却是在文學、史學、哲學、藝術和語言方面。

去年六月廿二日在莫斯科舉行了蘇聯漢學家聯合會的成立大會，聯合會的主席為蘇聯科學院院士、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斯拉得托夫斯基。根據大會通過的聯合會章程，這個組織將促進漢學各領域中的科研和宣傳工作，亦可見蘇聯對漢學的重視。不過，由於意識型態的作祟，蘇聯的部份漢學家皆從共黨政策立場去研究中國問題，其客觀性頗值懷疑，而純學術研究的漢學家又不為蘇共所容忍，因此，蘇聯的「漢學」亦逃不過為政治服務的厄運。